

我国外宣图书译介出版的 变迁及阶段性特征^{*}

◎ 王中雨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的外宣事业才真正开始, 外宣图书的翻译和出版开始走出零散化、自发性的发展模式, 走上系统译介和出版的轨道。近 70 年来, 我国的外宣图书经历了三个时期, 每个时期的出版重点根据国情和国际发展形式有所差异, 同时每个时期国家和社会关于外宣出版的出发点也有不同, 先后表现了我国政府、社会和文化界的制度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 外宣图书 译介出版 文化自信 中国故事

DOI:10.19393/j.cnki.cn11-1537/g2.2017.07.027

一、我国外宣图书翻译和出版发展概况

20 世纪以前, 中国的文化和典籍主要由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成外文在相关国家出版, 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论语》翻译成西文、英国的小斯当东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语、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将《三字经》《大学》《孝经》等译成英文, 这些由西方人主持和翻译的中国典籍意在向西方人解释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也是中国最早的外宣事业, 只是这种外宣是由西方人主持的。进入 20 世纪, 对中国文化和

典籍的对外翻译中出现了中国人的影子, 比如学贯中西的辜鸿铭翻译的《中庸》在 1906 年被收录进英国“东方智慧”丛书, 先后再版两次。林语堂编译的《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两书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 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和文明的重要著作。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是自发的、有意识的, 译作侧重于展现中国文化的精髓, 是中国最早的主动的对外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 中国共产党就把抗日战争中开启的对外宣传延续下来, 并以国家意志进行规划, 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系统的对外译介活动, 也就

投入及公共图书馆对阅读的推动作用也有待加强。但是, 与韩国各项指标增长乏力的趋势相比, 我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上升势头, 因而前景乐观。在政府、社会以及家庭与个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定能进一步推动国民阅读向前发展, 从而提高我国整体国民素质, 进而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교육통계서비스 (教育统计服务). [2016-07-12]. http://kess.chedi.re.kr/kessTheme/zipyo?itemCode=03&menuId=m_02_03_01.
- [2] 中国教育部信息公开. [2016-07-10]. [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xxgk/xxgk_left/info_catego-](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xxgk/xxgk_left/info_catego-ry_query/)

[ry_query/](http://www.moe.edu.cn/jyb_xxgk/moe_xxgk/xxgk_left/info_catego-ry_query/).

- [3] 한국교육통계연보 (韩国教育统计年报). [2016-07-10]. <http://cesi.chedi.re.kr/publ/view?survSeq=2015&publSeq=3&menuSeq=0&itemCode=02&language=#>.

- [4] 문화체육관광부 국가도서관 통계시스템 (文化体育观光部国家图书馆统计系统). [2016-07-10]. <http://www.libsta.go.kr/index.do>.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2015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http://zwgk.mcprc.gov.cn/?classInfoId=748>.

(作者单位: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 本文系 2016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项目批准号: 16YYB08) 的阶段性成果。

是今天所说的外宣工作。在新中国的外宣活动中,报刊占较大比重,但图书也不可小觑,外宣图书在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上起着报刊无法替代的作用。外宣图书的翻译和出版主要由国家相关机构推动,包括组织翻译团队、协调出版事宜、负责海外传播等,这有力地推动了外国人对新中国及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

同时,一部分海外华人和国内翻译家也加入到新中国外宣的行列中,以个人力量和志趣翻译中国文化和典籍,例如20世纪60年代陈荣捷和刘殿爵对《道德经》的英译;许渊冲几十年来把《唐宋词选一百首》《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译成法文出版,把《西厢记》《诗经》《宋词三百首》《楚辞》《唐诗三百首》等译成英文出版;汪榕培先后完成了《英译老子》《英译易经》《英译诗经》《英译庄子》《英译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英译陶诗》《英译牡丹亭》《陶渊明集》《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等译著。这些知识分子的翻译活动以文化经典为主,弥补了国家外宣翻译和出版行动的不足,成为我国外宣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我国外宣图书译介出版的阶段及其特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制度自信阶段,侧重中共党史、领袖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译介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外宣图书翻译和出版正式起步。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我国的外宣出版物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著作为主,同时译介和出版古今优秀的文学著作,以及介绍我国基本国情、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知识的图书。由于新中国成立初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宣传,因此毛泽东相关著作成为对外译介和出版的重点。

1952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对外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承担我国对外宣传图书的译介和出版,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重点从此主要通过外文出版社出版图书得以体现。1953年,外文出版社确定该社今后一段时间图书编辑的主要任务是“选择中国的优秀作品加以必要的编辑加工,以便形成外国文字出版”,出版物选择

范围确定为:“1. 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人民领袖的著作; 2. 文学著作——现代的和古典的; 3. 有比较广泛阅读价值的学术著作——历史、地理和其他科学著作; 4. 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对亚洲人民解放事业有切实意义的部分; 5.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文件”。^[1]作为我国外宣的前沿阵地,外文出版社的图书出版重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我国外宣图书译介和出版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中央高层推动,由著名学者钱钟书、金岳霖、王佐良等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英文译稿完成后,1954年由英国的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出版。^[2]1960年至1965年,中央联络部组织专家学者对英译本《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进行了审订修改,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一阶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法文、俄文、西班牙文译本也开始大量对外出版。新中国的外宣图书以《毛泽东选集》为先锋,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理论。同时,刘少奇《论党》《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党内斗争》等著作的英文版,以及英文版的刘少奇《五一报告》、英文和法文版的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法文版的高岗《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英文版的陈云《财经报告》、法文版的郭沫若《文教报告》等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外文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外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我国先后向世界多国发行对外宣传图书215万册(毛泽东著作达43万册),其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鲁迅短篇小说选》《人民中国手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从延安到北京》等的英文版发行量都超过五千册,属于畅销外宣图书。从1958年到1965年,我国先后经历了一些重大运动和事件,外宣图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经外文出版社翻译和出版的外宣图书主要有英文版《毛泽东选集》(1至第4卷),周恩来的《伟大的十年》,邓小平的《中国人民大团结和世界人民大团结》《列宁主义万岁》《中印边界问题》《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等出于政治发展需要的出版物。“文革”十年,我国外宣的重头出版物是“文革”小册子、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其他著作的译介和出版受到严重冲击,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这种外宣格局使世

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出现片面化。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外宣图书的翻译和出版,可以发现,这些外宣图书是基于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之路、革命之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成就的自信和自豪,是一种制度自信基础上的对外宣传。这种外宣的侧重一方面在于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验和成就,另一方面在于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用中国经验造福于世界。

2.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中国历代文化经典的译介出版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思想和文化界进入空前的活跃期,整个80年代成为我国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第二个思想解放的时期。这一时期思想和文化解放最大的特色就是积极引进和自信走出,因此在大量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的同时,我国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也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积极向世界推荐。在这种背景下,单一地向国外译介和出版领袖著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图书的外宣出版格局得到扭转,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化经典。1981年,应著名翻译家、时任《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先生的提议,首套高质量的英语版中国经典著作丛书——“熊猫丛书”作为外宣图书开始被纳入出版计划,由我国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国家级专业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该系列丛书的入选标准是作品有利于对外宣传中国形象,同时文学质量要求相对较高,入选作品要能代表中国一个历史时期文学的最高水平。从1981年开始到2009年,“熊猫丛书”共出版200多种,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已经成为中国外文翻译和出版领域的品牌,该丛书包括了《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十年代短篇小说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中国当代寓言选》等,以及陶渊明、蒲松龄、刘鹗、鲁迅、茅盾、沈从文、孙犁、王蒙、张贤亮、汪曾祺、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等古代、近代、现当代作家专集。^[3]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尽管“文化热”逐渐淡下来,但是从80年代起步的、以中国历代经典文化和文学作品为重点外宣出版活动延续了下来。以“熊猫丛书”为例,该丛书在80年代共出版96部,90年代又

出版了98部,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没有下滑。90年代的外宣图书中可与“熊猫丛书”相媲美的是提出和实施《大中华文库》(汉外对照)编纂出版工程。1994年7月,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全力推动下,我国出版界联合启动了大型系统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文库主要目的是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文化。该系列丛书选题分为哲学思想类、文学类经典、科学技术类经典、历史类经典、军事类经典等五类,包括了《周易》《道德经》《论语》《诗经》《唐诗三百首》《红楼梦》《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战国策》《史记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各类型经典,总共达110种中国历代文化经典。文库得到了当时最权威的学者和翻译家季羨林、任继愈、袁行霈、韩素音等的支持与指导,有18家出版社与文库进行了对接,其中包括外宣的龙头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我国出版业的品牌企业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译林出版社,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等地方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先后参与了该文库的翻译者选取、编辑与出版等工作。截止到2014年7月,文库共出版97种汉英对照版、11种汉法对照版、9种汉西对照版、8种汉德对照版、6种汉阿对照版、6种汉日对照版和3种汉俄对照版图书。随着出版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多,文库在世界多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一些国家汉语教学、图书馆、汉学科研机构的重要参考图书。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很重视文库的建设,多次作出批示,或在出访中向对方赠送文库中的《论语》《礼记》等书籍。^[4]文库同样得到我国学界的高度认可,季羨林先生谈到文库时说,这一翻译出版活动是“送去主义”,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出去,惠及全世界,并预见这套丛书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特别是在海外非英语世界的传播,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5]

纵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宣出版最大的变化:从提出项目到图书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以及后续工作,已经走出了政府单方面推动的格局,知识分子和社会力量开始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积极参与对外宣传图书的策划、译介等全程;从选题和出版物的内容看,更多地倾向于代表中国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最高水平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外宣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主体,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开放与“拿来主义”的

文化格局中，对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的特性有了深刻认识，并开始自觉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即文化自觉。

3. 新世纪以来：侧重“讲好中国故事”相关图书的译介出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继续重视传统经典和现代经典的对外翻译和出版，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多项对外译介工程。与译介经典同步，党、政府、社会出版机构和文化界开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宣传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叙事模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全民族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由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即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坚信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积极的感召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党提出了“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号召，文化自信通过文化和宣传部门的“讲好中国故事”得到体现。

“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号召也落实在对外宣传图书的选题上，一批注重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和当代中国故事的图书被译介和出版，在海外得到传播和推广。新时期对外宣传图书的译介和出版不再是由国家作为主要力量进行推动，出版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开始按照市场规律积极介入，中国各地相关力量也开始在外宣图书上做文章。新世纪以来，较成功的外宣图书是由中华书局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该书的英译精装本在出版半年时间内就销售了2.3万册，打造了外宣图书的成功案例，对于改变以往外宣图书“叫好不叫座”的境况，为外宣图书的选题策划提供了新思路。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策划和出版的外宣图书中，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全景中国》(PANORAMIC CHINA)中英文版系列丛书是另一个成功案例。

这一时期的外宣工作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由“讲好中国故事”向“讲好中国道理”过渡。通过策划“讲好中国故事”的图书，让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开放性，进入到中国文化的特色中；与此同时，国外

读者也更希望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外宣中也需要“讲好中国道理”。我国的一些出版机构也抓住了这一需求，策划了多种讲述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质外宣图书。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文版在海外发行以来，总发行量达四百多万册。该书通过回应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深切关注，向世界各国解释了中国的发展道路、理念和方向，从而赢得了国外读者的欢迎。同类型的外宣图书还有新世界出版社策划的外文版《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梦：谁的梦?》等，这些在海外销售量很大的外宣图书走出了外宣图书长期以来“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模式，以贴近外国读者的语言风格和观察视角，解读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接近了“中国观点，国际表达”的外宣表达的理想模式。

三、结语

经过近七十年年的发展，我国的外宣图书的译介和出版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的历程。尽管还存在一些因历史、文化和制度因素导致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外宣图书的翻译和出版已经走上比较成熟的道路，形成了可供参考的译介出版模式，这为中国未来的外宣图书的选题策划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经验。

参考文献

- [1] 戴延年, 陈日浓.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一)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1999: 35.
- [2] 王伟瀛. 文史钩沉: 钱钟书译《毛泽东选集》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06-29.
- [3] 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简况 [J]. 青山在, 2005(4).
- [4] 许多, 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3).
- [5] 季羨林. 从《大中华文库》谈起 [J]. 群言, 1995(8).

(作者单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